

# 西藏密宗的秘密



西藏密宗的秘密

虚雲老和尚過午不食，夜不倒單，詳看《虚雲老和尚見聞事略》 119 歲照



虚云老和尚言：「密宗一法，经唐代一行禅师发扬之后，传入日本，我国即无相继之人」，并不承认西藏密宗是佛教的一支。



冲古寺的喇嘛在吃饭，中间是一大盆牦牛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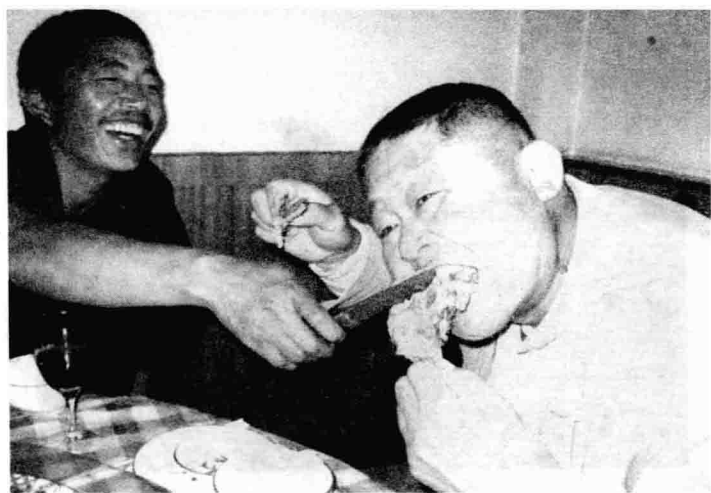
藏密至尊上师第四世多智钦·土登成烈华桑波



《梵网经》：‘夫食肉者，断大悲种子，非沙门，非释子！’



秋尼多吉活佛以茅台酒供护法



桌陀活佛请人吃牦牛肉



日波益西活佛与其他喇嘛在吃饭



日波益西活佛和他的妻子





## 序 言

西藏密宗在藏地已经流传了千余年。佛教界对于藏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者，以为藏密的喇嘛一边放生，一边喝酒吃肉，这和佛教的慈悲精神相违背，而男女双修等密法则严重违反了佛教戒律，且密宗不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亲传的法，根本就是假冒佛法的外道；二者，以为“显教是小学生，密教是大学生”（西藏密宗将佛教贬低为显教），藏密的密法不是普通根器的人所能修习的，喝酒吃肉、男女双修那是“大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不是凡夫所能理解的，大根器的修行者依密法修行，可以一生即身成佛。随着佛教界的法师居士对于藏密认识的逐步深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坚信不移者，有坚决反对者，有先反对密宗而后忏悔者——如弘一法师，亦有先推崇而后批判者——如太虚大师。

绝大多数的佛弟子因为地域、语言等原因，很难直接接触到藏密的真相，即便是有所了解，也往往是很肤浅很表面的东西，不过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已。这应该归功于西藏密宗喇嘛教圈子宣传战的成功，他们铺天盖地的出版了一些掩饰真相的宣传品。每当一本有关西藏密宗的学术著作出版，藏密就会出很多本宣传品附和来扭曲真相。在此种攻势下，真正有价值的研究藏密真相的学术著作就被淹没了，根本到达不了社会大众手中。好在经过一百多年来国际藏学界的努力，以及西藏密宗的喇嘛们为了获取名闻利养，而随意传播密法。因此，密宗的“密”早已不再是只有“活佛”大喇嘛才能知道的秘密了。佛法虽有八万四千法门的差别，但

是每一个法门只是修行的方式有所不同，不同法门的修证所依据的佛教修行原理应该是统一的，门门所证的法界实相——真如佛性应是一致的，且所成的佛、菩萨功德也是一致的。决不能因为法门有异，所修成的佛功德大小也有不同。因此本文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严格地按照佛教的经教，依据藏密公开出版的著作，列举事实，将藏密的“密”和盘托出，以供读者自行判断：西藏密宗到底是不是佛教的一支？相信读者阅读本文以后，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如此则信仰密宗的人士，自可以放心地安住于藏密之中继续修行；反之则要远离藏密，回归到清静纯正的佛法修证中来。

读者且请先阅读《高僧大德对西藏密宗的态度》，看看正反方的论点、论据是否正确充分，再阅读后面的内容。

# 目 录

序言	1
高僧大德对西藏密宗的态度	1
佛学院、大学教材对密宗的认识	45
西藏密宗发展简史	52
藏人为什么热衷于出家当喇嘛	107
西藏密宗的法脉传承和经典	123
四皈依、三昧耶戒与金刚地狱	130
不禁酒肉的西藏密宗	140
甘露丸	153
迁识法	163
诛杀法	166
辩经与格西	170
“活佛转世”制度的真相	178
中阴救度法	193
密宗的“名词术语”略释	198
灌顶	203
西藏密宗的“成佛之道”	218
故人已往矣，独立问天地——悼杨艳	237
当代藏学学者的理性反思	242
国家法律对喇嘛灌顶传法的限制	254
结语	256

## 高僧大德对西藏密宗的态度

所谓的西藏密宗，简称藏密，从表面上看，他们也编纂经典，建造规模极大的寺庙，寺庙里摆设的佛像也很庄严，并有为数众多的喇嘛僧人聚居于寺庙中。可是，西藏密宗实质上是套上佛法名词假冒佛教的外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喇嘛教。此喇嘛教在西藏，借助政教合一的政治力量，得以流传千余年。由于佛教的法师、居士多不知喇嘛教的真相，故对这一观点将信将疑，他们疑问最多的就是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佛教有八宗之说，其中便包括密宗，难道说密宗不包括藏密？”

历史上，密宗的确曾经是佛教的一个宗派。佛教中曾有一部分人擅长借助咒语以求和佛菩萨、护法神相感应，以便得到他们的加持和保佑，以减少学佛路上的阻碍，在这个基础上，逐渐形成密宗。唐代，密宗传至我国汉地，称为唐密。唐密中依照《楞严经》《千手千眼广大圆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准提经》等经典，通过身语意三密相应，来求证真如佛性者，这才是真密。唐密中真密的修行者持戒极为严谨，不犯女色，不沾酒肉，更不会将杀生当作修行。唐密在唐代传到日本，形成东密、台密，唐武宗皇帝灭佛以后唐密在我国就失传了。

西藏密宗的喇嘛不禁酒肉、破佛律仪，将淫邪的男女双身修法，当成“即身成佛”的究竟法门来修，其余所修的脉气、观想、灌顶、明点、诛杀法等等，也都是与佛法的修证

无关的外道法。

西藏密宗的修法和唐密中以三密相应求证真如佛性之真密完全不同。故民国太虚大师在其著作《中国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中如是说：

“密宗之概史，溯密宗之入支那（中国）也，其最盛时，莫唐代若焉（唐密）！当开元三大士来华，一时君相，礼敬如佛，尊崇之诚，弘扬之力，可谓已极！（唐密）乃行世未久，忽遭武宗之摧残，……降迄元、明之际，亦有所谓密教（藏密）者，则非复开元之旧，蒙藏红教传来之另一种耳；其异唐密，更不知相差几千万里矣！”

因此，虽然唐密、藏密都称为密宗，但是却有真密和假密之分——唐密中有真密，西藏密宗是假密。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西藏密宗不是佛教的一支，为什么历史上那么多的高僧大德不出面揭露藏密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太虚大师也有一个说明。太虚大师于1937年在汉藏教理院演讲稿《汉藏教理融会谈》一文里如是说：

“再讲显密问题。显密所以成为问题者，是由于密咒兴盛，而批判其余一切教法为浅显，成为显密对立，所以发生了问题。本来、密教传到中国也是很早的，大概在六朝时候吧，便有了杂密的经典输入。但是、真正的建立密教，还是在唐朝开元年间，当时有名的人物，如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等，都是专门宏扬密教的上师。并且在这时，（唐密）也传去了日本，并在日本形成东密、台密。中国的佛法，因为经过了唐武宗的毁灭，密教（唐密）也就一蹶不振，继之而起的是不立文字的禅宗。一直到了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密宗（西藏密宗），在北方五台山

等处也有很多密宗寺院；但多是喇嘛，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可说汉土民间信仰只属禅宗等；其焰口和其它的密咒，虽普遍于民间，为社会的风俗信仰，然非寺中修习的正课，如禅门日诵中的密咒，不过是附属的一种助行罢了。在民国六七年前（约1906年以前），还没有所谓显密问题。近年来，因为密教的勃兴，一方面有由日本而输入中国的东密、台密，一方面由蒙藏关系的密切，而传来黄、红、白各派的藏密。汉地佛教有了密教而占有重要地位，形成显密对立的状态，因而又产生所谓显密问题了。”

太虚大师这一段是说：在历史上，中国内地的密宗（唐密），形成于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公元716年以后），至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灭佛以后，唐密仅存百余年便失传了。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各朝，汉地佛教以禅宗、净土宗的修持为主，汉地佛教界和西藏密宗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即便是密宗的放焰口、密咒普遍于民间，但那也不是寺中主课，仅仅是一种微不足道的形式罢了。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我国汉地灭绝一千余年的密宗密法死灰复燃，原因有两个：

一者，日本的密宗（东密）传入中国。一九一五年，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两条就是日本对在华所设立的寺院享有所有权、日本僧人在华享有自由传教权。实是假传教之名，行帝国主义之实。随着日军势力的侵入，1924年日本的密宗（东密）僧人的权田雷斧（太虚大师称雷斧“然虽冒僧正之名，实缺僧行”）将东密传入中国。权田雷斧的弟子王弘愿，从雷斧灌顶以后，在潮州、广州、香港、汕头等地开坛灌顶，几年间受灌顶者

数以千计。民国期间，我国出现密宗人士的活动，始作俑者，即是王弘愿，受其影响，才有僧人大勇、显荫等人东渡日本学习密法（大勇回国后欲再去西藏学密，死于途中，显荫则死在日本，两人因为学密都受到了印光大师的批评）。二者，西藏的九世班禅、诺那“活佛”因和十三世达赖喇嘛争权夺利失势以后，害怕遭到达赖喇嘛的毒手逃到汉地来，为了生存不得不教授密法以取得供养，几年间皈依弟子数万人。因此民国期间，密宗密法经权田雷斧、班禅、诺那等人的大力“弘扬”，汉地的佛教界才对密宗密法有所接触和了解。汉地佛教界接触了藏密和东密以后，因密宗自夸是能教人“即身成佛”的顶级“佛法”，鼓吹“显教（佛教）是密教的基础”，而轻视显教，再加上部分汉地的法师居士由于不了解藏密的真相，也随着密宗之徒贬低显教的教法，由此而形成了太虚大师所说的“显密对立的状态”、“显密问题”。

西藏密宗虽然和汉地佛教界没有接触，但是却得到了封建帝王的支持。“元、明、清”各朝的中央政府，为了控制西藏，故皆极力地笼络西藏的当权者——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活佛”大喇嘛们。“元、明、清”各朝皆有不少帝王和西藏喇嘛学习密法，他们所学的密法即是套上佛法名相的男女双身修法，以便和后宫众多妃嫔享受淫乐，如《元史·哈麻传》记载：

西蕃僧人伽麟真善演揲儿法（男女双修法），秃鲁帖木儿将伽麟真推荐给元顺帝，帝习而喜之，“乃诏以西天僧为司徒，西蕃僧为大元国师。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谓之供养。于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

谓倚纳者，皆在帝前，相与褻狎，甚至男女裸处，……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着闻于外”。到了清代，仍然如此，如清代雍正皇帝提供雍和宫，供西藏喇嘛修双身法。并在皇宫中供养搂报女人的“欢喜佛”。《清稗类钞》中说：“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在清代，“欢喜佛”曾被用来作为王室皇子们性教育的模型，“流弊所及，遂主淫风大甚，男女无别”。

太虚大师以为：元明清的时候，因为蒙藏的关系，帝王很多信仰西藏密宗，但是藏密和中国僧众及民间信仰，没有什么关系。这一观点，不仅为我国史实所证明，同样也得到西藏密宗方面资料的印证，如西藏密宗的根本经典密续《那洛六法》一书说：

“本来密宗在昔日，只有帝王可修，民间连密宗之名尚且未闻，遑论修持哉！雍正皇帝因敬重喇嘛之故，特将其自居之雍和宫供养喇嘛，作为喇嘛修法之地，由此可知密宗之宝贵、喇嘛之尊高矣！”（《那洛六法》59页，道然巴洛布仓桑布讲述，卢以照笔录）

因此，历史上汉地的佛教大德没有出面批判西藏密宗，至少有三个原因：

第一，既然历史上汉地佛教界和藏密没有发生接触，汉地佛教界当然无从知悉藏密的淫邪法义，也就谈不上批判藏密了。

第二，西藏自元朝并入中国以来，因为西藏处在偏远地区，中央对西藏的管理鞭长莫及，所以“元、明、清”各朝的帝王为了控制西藏，皆对藏地采取怀柔政策，藏地有名望的“活佛”大喇嘛们往往受到优待，并封给官职，让他们直



接管理藏地，甚至有的大喇嘛成为皇帝的“帝师”“国师”，这就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与“元、明、清”各朝帝王礼遇藏密的“活佛”大喇嘛相反的是，此阶段各个帝王对于汉地佛教均采取限制发展的策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期间，如虚云老和尚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在重庆慈云寺开示说：

“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近来甚多，而政府特别加以崇敬，其意甚远。是否政府特别信仰，不得而知。惟对于中原青衣僧徒，则时加种种压迫，毁庙逐僧，不一而足。”

因此，元明清三朝是汉地佛教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在此条件下，即便是汉地佛教界知道藏密实质上是附佛外道，汉地佛教于自宗的发展，尚且步履维艰，何况是出面破斥密宗的邪见？在封建极权的时代，如果高僧大德出面批判皇帝的“帝师”“国师”，批判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不仅没有效果，而且难免性命不保。因此，西藏密宗封建王权的庇护下，并借助政教合一的制度，以武力财力作保障才得以流传千余年。

第三，西藏密宗所传的密法，喇嘛上师都奉为“至宝”，上师即便是对弟子，也要经过长期的考察（考察期多的有十二年之久），严格的灌顶，才肯传授。所以汉地佛教界无法深入了解藏密的密法，所知道的仅仅是皮毛而已。直到民国二、三十年代，随着西藏密宗以及日本的东密陆续传入汉地，尤其是法尊法师翻译了不少藏密自编并推崇的经论，如根本典籍《入中论》《密宗道次第广论》等，汉地的佛教界这才有机会接触、了解、研究西藏的密宗，并得出一些结论。民国以来，佛教界的部分大德，就自己所接触的藏密，随其理